

銅鼓一二事

——由一民族紀錄圖卷說起

陳玉秀

銅鼓是一種歷經兩千多年，仍被中國南方及東南亞的少數民族在喪葬，節慶等場合使用著的樂器。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中即有此款銅鼓十二件。（註一）

這種少數民族的銅鼓畫像，已出現在宋代（九六〇～一二七九）南詔

畫家張勝溫的〈梵像卷〉（圖一、二）。其圖說中並提及南詔國鑄銅鼓以鑄佛像之事。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謝遂〈職貢圖〉紙本畫卷，為目前所知由官方所命而繪製的民族紀錄畫卷中，難得的兼有畫像、圖說並提及銅鼓的圖像資料。此畫卷成於乾隆十六

年（一七五二）至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間，主要描繪中國沿邊各少數民族，以及東西洋各國官民男女。據軍機處「上諭檔」的紀錄，此圖卷中的圖像為當地官員依所見的民族形象，據實繪成圖後，送進宮中製成圖像，圖像上方並以滿、漢文二體書來圖說；其圖說為圖成之後交軍機處撰寫，進呈御覽後，由軍機處繕寫員寫入畫中。〈職貢圖〉全卷總長六八五四·七公分，縱約三三·七公分，合計三〇四圖，其中最後記載越南民族的三幅已缺。圖像中的人物兩兩成對或三人成組，畫像內容與文字記載相



圖一 張勝溫《梵像卷》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張勝溫《梵像卷》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呼應，紋飾描繪精細，人物間藉由視線及肢體的動向來表達彼此的互動，極為生動。

謝遂〈職貢圖〉中，提及銅鼓的圖說分別見於

第四卷第十九圖、第五十三圖、以及繪有銅鼓圖像的第五十二圖（圖三）。三圖圖說中除了紀錄人物的族別、當時的居所及其分佈區外，對此民族的節慶禮樂、風俗民情、衣著色彩也多有描述。如第十九圖的圖說中所記：「雲南省，曲靖等府苗人：過節序

則擊銅鼓吹角賽神」；第五十二圖：「歲首男女相聚擊銅鼓，吹蘆笙，唱歌為樂」；另第五十三圖的圖說中亦道：「祭尚枯魚，歲時擊銅鼓，或掘

地得之，即以為諸葛所遺，富者重價以購，其輸賦，亦與齊民一體」。觀察圖三右方的男子，其雙手持鼓棒，正敲擊著一置於地面上的銅



圖三 謝遂〈職貢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鼓。銅鼓呈綠色，器形上，鼓的面徑僅鼓底徑的二分之一，並附有鋪首環形耳。鼓身中間以一圈雲鳳紋爲主要紋飾，方、圓形的雷紋、葉紋爲邊飾，上下各以一道乳丁紋收鼓邊。圖中所繪銅鼓的紋飾及佈局常見於明清兩朝的銅鼓。而其上窄下寬器型，於目前收藏的銅鼓中並不常見。

上述〈職貢圖〉的圖說除了提到年節及賽神時銅鼓被作爲樂器使用外，並提出了兩個議點：其一，銅鼓常經由「掘地而得之」；其二，「銅鼓爲諸葛時代」所遺留下的。

首先就「掘地得銅鼓」之說而言，文獻上銅鼓得之偶然的記載不計其數，如南宋詩人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在《桂海虞衡志》中寫道：「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而此亦爲銅鼓出土的情況，全世界目前已超過一五〇〇件的銅鼓收藏中，墓葬出土的銅鼓總數亦不到五十件，且大多分布於越南北部、雲南、貴州及廣西一帶，年代亦多爲東漢以前的銅鼓類型。至於其

它上千件的銅鼓，通常出土地不明，博物館的銅鼓亦大多向廢銅收集處或從民間徵集而來，即使有出土地點，也無墓的形制或陪葬品可作爲斷代的依據。

文獻中提到銅鼓埋地的原因很多，其中周去非《嶺外代答》云：「銅鼓……交趾嘗私買以歸，伏埋於山。」近人劉錫蕃《嶺表紀蠻》中寫道：「黔桂邊境一帶，往往掘得此物，連續埋藏。動輒以數十計，均在深溪密箐之間。吾人由此推測，可知有鼓者，亦不限於行軍，……其所以得於林間，大概由蠻民屢屢屢叛，官軍攻剿戰事激烈，蠻人自度必敗，以其笨重難攜，遂埋於僻地。」

而今日使用銅鼓的民族，仍常將鼓埋於地下。根據汪寧生的調查研究，廣西的瑤族與雲南文山的傣族等，用完銅鼓即埋，以茲保護，等要用時再取。又如現居於貴州中和的水族來說，平日銅鼓不用時，將其保存於家中，若家中無子可傳，將死時會將銅鼓埋於地下。綜合以上，可知

「掘地得銅鼓」的現象，其來有自，而此種風俗民情亦沿襲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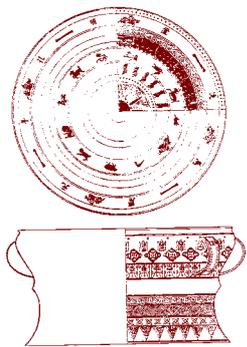
其次就圖說中「諸葛銅鼓」的問題來說，其實在漢字文獻上的記載，銅鼓常被稱爲「伏波鼓」或「諸葛鼓」。《後漢書·馬援傳》：「……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鑄作銅馬法獻之。』」馬援（公元前一四～公元四九）爲東漢時人，於交趾（今越南河內一帶）得銅鼓後，乃仿以銅鑄鼓的方法來鑄銅馬。此說到了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器條》開始銓釋成爲「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此後銅鼓被誤解爲馬援所製。而明代支允堅的《異林》中也已提



圖四 〈天元孔明〉鼓
引自蔣廷瑜《古銅鼓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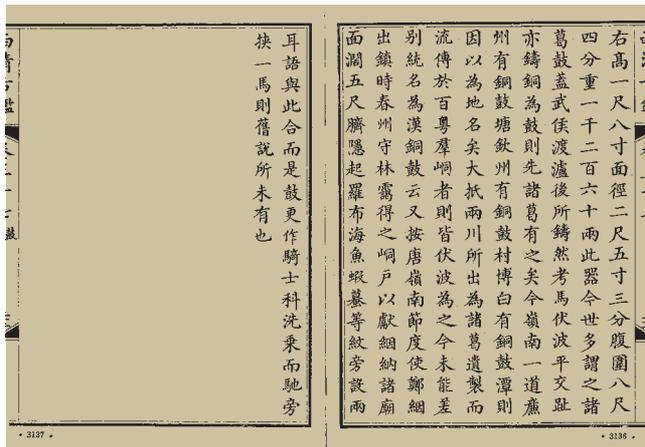
到：「今銅鼓兩粵滇黔皆有之，又或以為諸葛武侯者，不必盡伏波也。：：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

以廣西都安縣徵集來的一面銅鼓（圖四）為例，此鼓鼓面紋飾佈局工整，以兩圈乳釘紋為鼓面紋飾分線，以漢字為主紋，鑄有大的楷字「福壽進寶」及介於大字間較小的楷字「天元孔明」。天元為元脫古思鐵木兒的年號（一三七八～一三八七），孔明指的是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此鼓或自稱為孔明鼓；再以貴州省博物館從興義縣徵集來的銅鼓（圖五）為代表，鼓的第八暈為主暈，鑄有楷書「萬曆元年，孔明置造」的銘文，在此諸葛孔明為三國蜀（二二一～二六



圖五 〈萬曆元年〉鼓
引自蔣廷瑜《古銅鼓通論》

三）人，萬曆為明神宗（一五七三～一六二〇）的年號，此文句實無法將其時代連在一起。然而兩鼓皆說明了從十四、十五世紀末銅鼓被稱為孔明鼓的事實。就三〇到五〇年代的民族學紀錄，貴州南部苗族自治區中的水族及居於廣西、貴州、湖南三省交界的侗族，仍然傳說著銅鼓為孔明遺物，因崇拜諸葛孔明氏，故以其名稱



圖六 《西清古鑑》第五冊 鼓一

銅鼓。

由於「伏波」和「諸葛」為漢代及三國人，以此來通稱銅鼓也影響了對銅鼓年代的看法。例如清乾隆朝官修的銅器圖錄《西清古鑑》及《西清續鑑》甲乙兩編，為目前所見將銅鼓編入圖錄中並給予圖說的清宮藏品圖錄。其中《西清古鑑》第一鼓圖說載道：「：：：此器今世多謂之諸葛鼓，蓋武侯渡瀘後所鑄，然考馬伏波平交趾亦鑄銅為鼓，則先諸葛有之矣。：：大抵兩川所出為諸葛遺製，而流傳於百粵群峒者，則皆伏波為之：：：今未能差別，統名為漢銅鼓。」（圖六）高宗仍將所見的銅鼓歸納為漢代作品。而現在考古出土的銅鼓極多，以國立故宮博物院銅鼓為例又是何年所鑄呢？

兩類銅鼓

觀察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十二件銅鼓，筆者以為，無論器型或紋飾皆有可討論之處。並將銅鼓分為兩種型制，其中I型一件、II型十一件。而

以筆者的觀察《西清古鑑》及《西清續鑑》甲乙兩編共廿三件銅鼓線繪圖，故宮藏I型鼓與《西清古鑑》中的鼓一、鼓四、《續鑑》甲乙兩編中的第一鼓類似；而《西清古鑑》中從第八到第十四鼓，《西清續鑑甲編》第三及第四鼓，《西清續鑑乙編》的第二到第五鼓皆與故宮藏的第II型鼓同類。

I型鼓

故宮I型鼓僅一件(圖七)，其面徑及底徑皆在七八公分左右，高五四·七公分，腰圍二〇一·五公分，重四〇·二公斤。狀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所述：「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致，四角有小蟾蜍」，鼓面略大於鼓胴，下接急劇收縮的腰身，及漸大的下擺，折棱下接撇足，兩側各置兩耳。

從紋飾上來說，一般銅鼓的紋飾在佈局上較制式化，兩千年來的格式大多以被稱爲「太陽紋」或「星紋」的帶芒圓型體(見圖七)爲中心，芒外以同心圓的平行線來界定暈圈，圈內

填以紋飾。帶有此種中心紋飾的銅鼓遍佈整個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各地的銅鼓，就目前考古出土的資料來看，以雲南萬家壩出土的西漢銅鼓爲早期的銅鼓類型，其圓型厚實的圓心體，並無帶芒；之後的銅鼓，其芒數多爲偶數，由八至十六道不等，而以十二道爲多，並成爲宋代以後銅鼓的定格。以故宮十一面II型鼓爲例，中心紋飾亦皆有十二道光芒，但芒的粗細及長短各不同。至於爲何銅鼓以此種紋飾爲中心？雖然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古代少數民族有崇拜太陽爲天鬼的風俗，例如雲南馬關縣的壯族，每年的二月第一日，要在寨子附近，面對日出或日落的方向祭祀太陽。但據此仍無法證明此種中心紋飾爲因爲對太陽的崇拜而鑄於銅鼓之上。

其次以I形鼓的鼓面(見圖七)爲例，於十二芒的太陽紋芒間，飾單線墜形紋，芒外暈圈幾乎不留白地直佈到鼓邊。暈中疏朗排列著羽紋、同心圓紋、線型的梳紋、複線交叉紋，並以圖案化的鳥紋及長尖嘴的鳥紋爲

主紋。圖案化的鳥紋以一同心圓紋爲頭部，圓紋的最外圈頂部，以一前伸的線條爲鳥嘴，全身以平行直、橫線組成類似方型的鳥體；長尖嘴鳥的輪廓以陽文勾勒，有長長的尖嘴，頭上有纖細的羽冠，冠下有圓圓的眼睛，向身軀兩側相對平展的翅膀不寬，呈三角型，尾羽呈扇型，並以短直線表示羽，鳥的輪廓清晰簡潔。鳥紋於漢代已出現在銅鼓上，而圖案化的鳥紋一直到東漢時期才開始流行，且一直延續到宋代。

長尖嘴鳥紋亦爲銅鼓最爲普遍的動物紋飾，對於其稱呼，學者們有不同看法，有稱翔鷺，朱鷺，鶴鳥，越南亦稱其爲駱鳥，而此稱呼皆以少數民族圖騰信仰，對鳥崇拜的解說爲出發點。出土銅鼓上的飛鳥數目不等，但大部分爲偶數，最常見的爲四隻，其次爲六隻，如越南的銅鼓。而東南亞寮國銅鼓上的飛鳥可達四〇隻之多，鳥的飛行方向幾乎都是逆向繞著太陽飛翔，但奇數九隻鳥如故宮藏鼓，實不多見。



單數的鳥紋飾亦見於故宮I型鼓的鼓面，鼓面四周立有四蛙（圖七之2）及一鳥（圖七之3）。如前所述，銅鼓的動物圖案通常以偶數出現，亦常見與其它塑像組成偶數。在故宮的I型鼓上的鳥及

蛙塑共五只，為不常見的現象。鳥足穩健的駐立於鼓面上，圓胖的鳥身有一短頭，頭上的雙眼圓突，嘴尖短。鳥身短翅，作展翅狀，並以同心圓紋為鳥之羽毛，整體極為精緻可愛。鳥塑像為銅鼓鼓面的紋飾所見不多，極

圖七 東漢末—南朝 銅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有限的分布於廣西省潯江一帶，而大部分的鳥像少有紋飾，相對於故宮I型鼓的鳥像，精細的塑出圓圈型的羽狀，為罕見。

以線條來表現的鳥紋，尙有如圖七4表現於I形鼓鼓身的腰部，界格內的變形羽人鳥紋，羽人頭頂著三角形上接半圓形的羽冠，羽人身體如鼓膛的船紋，以點及短線來表現，整體構圖幾何化。羽人的出現早見於雲南石寨山型及廣西羅泊灣等地出土的漢代銅鼓，其表現法極為逼真，可看出羽人舉手投足舞蹈的樣子。而抽象幾何化的羽人要一直到東漢時期才開始流行，且已不易辨識其手足。

相對於鳥塑像，鼓面上的蛙塑像，為最常見的銅鼓立體裝飾之一，從中國的廣東、海南、廣西、貴州、雲南、到越南北部、泰國、緬甸東北，覆蓋了最主要的銅鼓分布區。但最多的蛙像銅鼓則集中在廣西的境內，通常銅鼓上固定以四隻蛙為飾，故宮藏鼓的蛙像無紋飾，空身扁腹，兩眼圓突，極為有力的四足挺立並以

逆時針的方向前進。銅鼓上的青蛙紋飾，一向被認為是由對青蛙圖騰的崇拜。銅鼓在雲南的佤族中，亦被稱為「蛙鼓」；傣族稱其為「蛤蟆鼓」，緬甸克耶族稱銅鼓Pa-Ni，亦即為「蛙鼓」之意。仍在今日，廣西紅水兩岸的壯族，在舊曆年的正月初一為螞蚱節，此節為賽神祈豐收的節日，此日村民擊著銅鼓到田裡找青蛙，葬蛙，之後男女對歌並擊銅鼓舞蹈，對歌的歌詞中唱道：「螞蚱神啊螞蚱神，打著銅鼓接你來到：明年銅鼓響了你要來到。」在此似乎唱出了沒有銅鼓就沒有螞蚱，可見蛙與銅鼓相互間的重要性，如此在銅鼓上以蛙為飾是可想見的。

圖七5故宮I型鼓的胴部，飾以相背半圓形的變形船紋及人物，以點及線來描繪。船與船之間互不連接，而相背的兩船船底卻相接，似乎意味著船隻於水中的倒影。以出土的銅鼓來看，此類紋飾皆飾於圓弧型的鼓胸，佈局上設計師在儘量利用每一個空間的同時，採用了

圖像多層次排列的構想，將空白處填滿。船紋早期以寫實的樣式出現，見於戰國時代，極盛於西漢。並分佈於雲南、泰國、越南及老撾等地。東漢以後，衍化成如此件故宮I型鼓上之極為抽象化的船紋，但在宋代以後的銅鼓船紋已不多見。

至於為何以船為紋飾，學者們的看法不一，但皆以各民族的習俗來說，認為此為先民渡海的紀錄，或為至今仍普遍存在的龍舟競渡圖等。其實目前尚有許多少數民族有水上節日，例如雲南大理白族有「耍海會」，又稱「撈屍會」。傳說南詔時代，與毒蟒搏鬥的英雄，溺斃於洱海；或說堅貞不從為妾的夫人跳海身亡，人們紛紛划船趕去撈屍。以後每年為紀念其亡日，白族人必著盛裝，於洱海上競舟、對歌、唱戲等活動，以茲紀念。

圖七6，I型鼓的足部以菱形紋，下接圓心垂葉紋，羽狀紋下接菱形眼紋。圓心垂葉紋為一種倒立三角形，兩側有兩道由點連成的虛線，其



圖八 宋一元 銅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宋一元 銅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宋一元 銅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行相套構成三角形的外框輪廓，靠近底邊的正中爲一複線同心圓圈紋。以考古出土的資料來看，此種足邊紋飾約在宋代以後由虛線變成實線，中心的同心圓不見，成爲如故宮II型鼓上的複線角形紋（圖八）。

其次I型鼓近足底的菱形眼紋，是以兩條由點構成的虛線，組成菱形的外框，如圓心垂葉紋亦以複線同心圓圈紋爲中心。此種紋飾爲故宮I型鼓類型的典型紋飾，宋代以後的銅鼓就不常見到此種紋飾。

從考古出土的例子來看，故宮I

型鼓最常見於廣西一帶，以一九七五年廣西冷水沖出土的銅鼓爲典型，冷水沖銅鼓內伴隨出土嶺南東漢晚期墓常見的水波紋和四絃紋四耳陶罐一件。廣西金平道的南朝墓中亦出土此型銅鼓，由此可知目前此類銅鼓的年代從東漢末到南朝皆有之，亦即故宮的I型鼓鑄造的年代應在二到六世紀間。

II型鼓

故宮的II型鼓共有十一件，面徑

及底徑皆在五〇公分左右，高三〇

公分，腰圍在一三〇~一五〇公分之間，重約三〇公斤。由正面（圖九）來看，可看到鼓胴大於鼓面，側看鼓身（見圖十），有一折棱平分鼓腰及鼓足，此種鼓身的二分法，令整體看起來短矮。相較於I型鼓，II型鼓兩側的瓣紋雙耳（圖十二）亦提高置於鼓胴及漸細的腰間，就考古出土的資料來看，短矮的II型鼓類型及鼓耳位置上提的銅鼓，大量流行於元到清代之間，於雲南、貴州、廣



圖十一 宋一元 銅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四川及湖南等地。

與 I 型鼓的緊密佈局及以抽象化紋飾為主題的銅鼓鼓面比較，II 型鼓鼓面紋飾（圖十二）的佈局較疏朗，樣式亦簡單化。兩道凸圓點的乳丁紋，將鼓面分為以太陽紋為中心出發點的內、中、外三區。第一道乳釘紋內以太陽紋為中心，細長的芒間以由故宮 I 型鼓單線心型紋變化而來的複線心形紋填充，向外以類漢字的「西」形圖案及勾連雲紋為內區裝飾。以目前出土銅鼓的分類，最遲到了元代於裝飾上加入了許多漢字元素，類「西」

字型紋即為太陽紋芒間常見的飾紋。

II 型鼓的主暈位於兩道乳釘紋間，宋代以後銅鼓鼓面上出現的變形游旗紋及平行短線梳瓣紋為主。游旗紋，是一種由一圓圈綴兩條飄動的帶子組成的紋飾，此種紋飾亦被認為是由 I 型鼓中的圖案化鳥紋變化而來，或為道教的一種旗帙。雖然它的來源尚不明確，但早見於貴州遵義南宋楊粲播州土司夫婦石室合葬墓出土的楊粲銅鼓。據報告的記載，依其兩塊斷碑的落款分別為「太歲丁未淳祐」（一二四七）及「太歲辛亥」（一二五一）。

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賣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製，得者科罪。」而從鼓型而言，楊粲鼓的鼓身以折棱二等分為特點，與故宮 II 型鼓雷同，然而其鼓耳的位置卻仍保有故宮 I 型鼓位於鼓膛中下方的特色，此與故宮 II 型鼓耳位於鼓面沿端的特點，令筆者無法將故宮 II 型鼓將其歸為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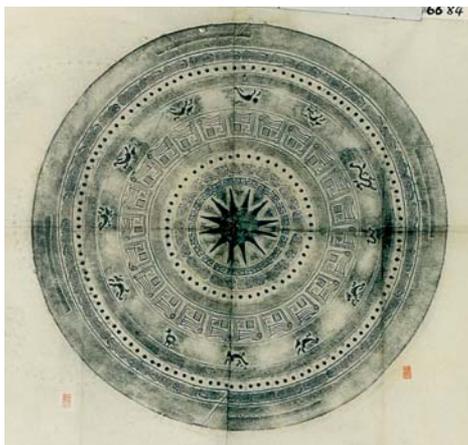
也就是說故宮 II 型鼓或許較適合類入元代以後銅鼓的類型，此可以已於第一章提及的「天元孔明」鼓（見圖四）為代表，此鼓形制短矮，鼓面紋飾佈局工整，亦以兩圈乳釘紋為鼓面紋飾分線，如上所言此鼓以漢字為主紋，類「西」字型紋飾於太陽紋芒尖。鼓身的紋飾，在鼓胴的最大圍處設一乳釘紋圈，由此而下與外撇的鼓足間，以一無紋的凸棱將鼓身二等分。紋飾的佈局，亦以此凸棱二等分，以雲雷紋、如意雲紋等來裝飾，

鑄成，錢文尚隱約可見，此錢幣最早鑄於北宋哲宗元祐（一〇八六）—一〇九一）年間。因此，此鼓的鑄造年代比較明確，可能在北宋元祐到南宋淳祐（一二四一—一二五二）之間或之後。其實鑄鼓以銅錢為原料，歷來皆有記載，在成書於七世紀前半葉的《晉書 食貨志》卷二十六記載了晉孝武帝三年（三七五）下的一條禁令：「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



圖十二 宋一元 銅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紋飾層層相疊並藉由鼓身的空白處分出紋飾帶。鼓面紋飾佈局工整，以兩圈乳釘紋為鼓面紋飾分線，類「西」字型紋飾於太陽紋芒尖，此皆如故宮II型鼓，然而如上所言此鼓鼓面以漢字為主紋，面的最外圈為八卦紋，整體而言，此鼓採用了許多漢化紋飾，亦即漢化的程度較故宮II型鼓來的深刻，為元代以後銅鼓紋飾的特色。例如就已知確定為明清兩朝的銅鼓中，更常以漢化的紋飾為主題，如漢字或剪影式的十二生肖動物等圖案為主紋，並以兩圈或三圈乳釘紋為鼓面紋飾的分界，如前述圖五的「萬曆元年」銅鼓（見圖五），就以剪影式的十二生肖



圖十三 明一清 銅鼓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肖動物圖案為主紋。故宮藏品中尚有一張鼓面拓本（圖十三），也以剪影式的十二生肖動物圖案及兩圈乳釘紋為鼓面紋飾的分界，應亦屬於明晚期到清代的作品。且大部份分佈於廣東、廣西及貴州等地。

綜合以上資料得知，故宮II型鼓的年代應界於北宋到元之間，亦即十一世紀末到十四世紀中期，而鼓面拓本，應亦屬於明晚期到清代的作品，即十六世紀末之後的作品。

小結

由文獻的紀錄及民族學上的研究，大部分南方使用銅鼓的民族在銅

鼓不用時有將銅鼓隨地而埋習俗，致使銅鼓的出土大多無伴隨物可作為銅鼓年代的參考。而由故宮銅鼓的型制及紋飾上來看，兩類形鼓的年代各以一段三到五百年的間距來定年，可知銅鼓在風格上的變化是極緩慢的。

參考書目

1.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一。
2.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九。
3. 蔣廷瑜，《古銅鼓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
4. 蔣廷瑜，《銅鼓史話》，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
5. 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中國古代銅鼓》，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
6. 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
7. 鄭師許等，《銅鼓考略》，台北：東方供應社，一九七二。
8. 汪寧生，《銅鼓與南方民族》，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
6. *Dong son drums in Viet Nam*, by editorial Board, Pham Huy Thong, published by The Viet Nam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0.

註釋

-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中尚有院藏號（購銅000184）一件不同類型的銅鼓。因與此本文的重點不同，所以在此不多敘。